

# 柯庆施是中国最早见过列宁的人之一③

历史纪实



宋国涛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友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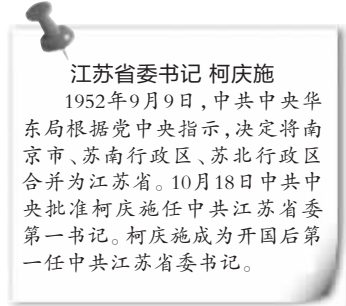
##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建设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本书介绍了彭真、黄敬、林铁、程子华、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市、自治区)委书记的事迹,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

## 【上期回顾】

1947年,“红色之子”乌兰夫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江苏省委书记 柯庆施  
1952年9月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南京市、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合并为江苏省。10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柯庆施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成为开国后第一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柯庆施是安徽省歙县南乡竹溪人,1917年秋,他从家乡途经芜湖、南京,到达上海,通过阅读《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也是安徽人,1920年初到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陈独秀的接触对柯庆施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成为柯庆施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时他年仅18岁。

1920年冬,柯庆施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1921年7月,柯庆施远赴苏俄参加会议,并在苏联参观学习。

翌年1月,柯庆施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成为中国最早见过列宁的人之一。

1922年夏天返国,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不久由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陈独秀也从莫斯科回国,由于柯庆施此前有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经验,陈独秀与中央其他负责人商定,派柯庆施到安

徽做共青团的工作。

柯庆施来到安庆。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的省会,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安庆知识青年思想非常活跃,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开展,各类进步书刊广泛传播。

柯庆施找了一份工作,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当编辑,以此身份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柯庆施主要负责报纸副刊及国内新闻的编辑,他利用这个报纸尽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并经常转载《新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的文章。

利用报纸编辑的身份,柯庆施经常来往于安庆与芜湖之间,开始与芜湖地方青年团创始人密切交往,参与恢复和整顿芜湖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帮助芜湖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建立了安庆与芜湖的青年团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历史进入了10年内战时期。中共党的工作主要在两条战线展开:一是以农村革命根据地(苏区)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在敌占区大中城市(白区)的革命斗争。1935年,柯庆施被派往河北省白区工作,担任中共河北省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工作。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当天,柯庆施于硝烟弥漫中进入石家庄。

“共军攻克了石家庄,中共派了柯庆施当市长。”这是1947年底上海《新民晚报》一篇题为《红色的石家庄》的通讯登载的消息。

石家庄解放之前,国民党对石家庄实行毁灭政策,把它当作内战堡垒,封锁了市内外交通,把石家庄变成一个陆上孤岛,同时横征暴敛,抓丁派夫,贪污无厌,特务横行,工商业奄奄一息,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柯庆施率部进入石家庄,就在原伪建设总署院内的防空洞里办公,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小米饭加咸菜,睡的是草垫,办公用的是一盏油灯,往往一夜过后脸鼻都熏黑了,一直到进城后的第5天,在工作人员的坚持下他才换了个地方。

当时,市内不仅有日伪时期的汉奸,而且还有被我军击溃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和一些土匪强盗,大批潜伏特务也还在进行破坏活动。

柯庆施亲自找公安局局长谈话,要求公安部门开展以打击土匪强盗、清查敌特残余为重点的“挖蒋根”运动。市公安局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侦破了石家庄解放后第一个国民党潜特案件,查获了潜伏特务头子崔希正偷藏在某局长中堂画轴里的特务花名册,清除了国民党敌特机关“十九号”。

还有很多私营商家和个体商贩囤积粮食、哄抬物价,老百姓非常恐慌。柯庆施化装成普通市民,赶到市内的休门集市调查了解情况,指挥市税务局稽查科严厉查处哄抬物价抢购粮食的不法商贩,抢粮风波被迅速平息。

石家庄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创例”,石家庄的接管是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柯庆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1949年4月20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南京,红色电波就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任命刘伯承司令员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南京市市长,任命柯庆施为南京市副市长……”

听到这条消息不禁使柯庆施感慨万端,回想起来,他最早到南京是在1920年2月,如今历经29年的“峥嵘岁月”之后,他又重返南京,而且出任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副市长。

接到正式任命后,柯庆施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协助刘伯承接管南京的工作迅速铺开。到了1950年元旦,南京市民欢度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新年时,南京的城市接管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柯庆施在市政府迎新年大会上总结了南京的城市接管经验,勉励市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努力地工作,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1950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南京市市长,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柯庆施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52年9月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南京市、苏南行政区、苏北行政区合并为江苏省,同时将原属山东辖区的徐州市、东海连(连云港)市划回江苏省,江苏省的总面积与管辖范围有了明显扩展。行政区划调整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0月18日批准柯庆施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成为主政江苏的要员和最核心人物。

1954年8月,柯庆施在开完江苏省一届一次人代会后,告别了相处5年的南京,前往上海,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 逃难过程中我们遇上了李四光夫妇⑥

传奇人生



许燕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

## 【内容简介】

“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羨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成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

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 【上期回顾】

港英政府投降日本后,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妈决定带我们回内地。

不久就到了澳门。澳门是经常听说的,就是没来过,兴致很高地跟妈妈上了岸。这里没有打过仗,街面上比香港要好得多。

第三天,总算到了广州湾,现在叫湛江,当时归法国辖属。广州湾是港区,市区在赤坎。妈妈叫了辆出租,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叫“迎宾旅馆”的小店。我们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为的是等钱。

爸爸活着时工资虽高,但开支也大,除供在内地上学的姐姐外,还经常援助逃难来港的青年人,所以积蓄不多。即使有钱,日占期也不让百姓取走。梁漱溟先生离港前托人给妈妈带话,说他回内地了,妈妈由此知道有东江游击队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可是爸爸死了,我们就不在营救的范围内,所以妈妈虽多方打探也联系不上,直到后来听说国民政府有救济离港文化人的资金,才敢带我们回来。到赤坎后,妈妈就急忙和内地联系申请这笔路费,她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和邮电局之间。

我每天帮着婆婆把海水浸湿的行李打开,逐件漂清,拿到旅馆的顶棚上去晾晒。最难晒的是爸爸的书和文件,得一页页地翻着晾晒。哥哥很少上来,他几乎整天在和同旅馆的住客们聊天。那些住客也多是来自香港来的,都知道爸爸,所以对哥哥很热情。

终于,妈妈托人帮忙申请的救济金寄到了,我们又忙着做启程的准备。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进攻,把广州湾通玉林的公路挖断了,往来交通只能步行或乘轿子。妈妈托靠了中国旅行社。旅行社要求每件行李不超过50斤,以便挑夫担运。于

是我们买了许多带锁眼的帆布袋子,将行李分装成38件,写标签,又是贴又是缝,总算诸事齐备。旅行社安排了三乘轿子,轿子前面贴着乘轿人的名字,妈妈轿前贴的是“许地山夫人”,到了海关,工作人员都出来打招呼,很是热情。

第七天,到了广西的玉林,轿子旅行就结束了。我们将行李又合并起来,乘汽车去柳州。到柳州,我们直接去从北京搬来的香山慈幼院。熊婆婆事前就给关照过了,学校已腾好一个大房间。安置妥当后,妈妈就一个人到桂林找工作去了。

三个星期后,妈妈回来了,她已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心情挺好。可我们没时间在此久留,很快就要去湖南投奔五娘家。我们一家四人上了北去的火车,妈妈要把婆婆交给五娘赡养。四娘和五娘住在一起,她们姊妹三人要团聚一次。

总算到目的地时,已是1942年底,转眼我就要满10岁了。我们来了,四娘一家顿时热闹许多。不过,五姑爹几天后就回桂林上班去了,妈妈不久带了哥哥去衡山,还去了一趟当时南迁的省会来阳。原来省教育厅的厅长朱经农是五姑爹的堂兄,中教科科长余先勋夫妇是妈妈北师大的同学。他们都留妈妈到教育厅工作。妈妈考虑来阳离衡山近些,又有亲戚朋友照应,就辞了广西的聘请,带了哥哥去来阳。可是,飞机掉下来砸了妈妈的饭碗。

就这样,因为战乱,妈妈带着我们,和四娘、五娘一家又辗转到了贵州省的独山。独山是个边远小镇,幸而还有一所中学。那时正在暑假里,教室都腾空,供逃难者驻脚。我们大家又团聚了,东西也没丢失,人也

有伤病,这在湘桂大撤退中可称是最幸运的了。

过了几天,五姑爹找了一辆车,装上他们的行李和人,连四娘、四姑爹一起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了。妈妈、刘娘(在奔逃中,妈妈巧遇到的中学同学)和我们两个孩子因为车实在坐不下,便留下来。妈妈每天出去找车,发现隔壁教室躺着李四光夫妇。李夫人许淑彬是我妈妈中学的老师,老夫妻都在病中。妈妈和刘娘热心地给他俩帮助,悉心照顾。湘桂逃来的人每天都有不少,可是从独山去贵阳的车很有限,烧木炭,路不平,山陡谷深,滞留独山的人愈来愈多,我们又这四个妇孺,一是走不动,二又怕土匪抢劫,不敢步行去贵阳,困在独山钱也快用完了,真是孤苦无助,一筹莫展。

一天,忽然听见有人依次在每个教室窗外问:“里面有位许地山夫人没有?”妈妈一跃而起,迎出去。一问,原来是贵阳交通银行的行长邹安众派人来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邹行长是我外公的朋友,也是我爸爸的朋友,听说我们也在湘桂撤退的人流中,就让银行拉货的车来探问,这回还真问到了。司机很高兴,我们更是如逢救星。搭上银行的货车到了贵阳,被安置在银行新建的一排平房里。接着又遇见一桩好事,妈妈在求职中碰到她北师大的同学崔老师,还有她好朋友的弟弟赵泽环。他们都在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任教,向校长力荐。这样,妈妈和刘娘都不再失业,哥哥和我也都可以在十四中上学。困难的事都解决了,我们也不用再去那充满未知数的重庆了。

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又打来

了。11月底,形势愈来愈严重,十四中准备北迁,同学们陆续有随家人逃难退学的。凡是要跟随学校步行转移的,去教务处报名,转移到何处也没说定,一时人心惶惶。学校也停了课,留下的同学都是随校走的。我目送着大队人马,直到看不见了才回来,满腹悲愤惆怅。

离开了空荡荡的校园,我们又踏上了逃难的路。

因为四娘、五娘从衡阳出来就直达重庆了,我们到了重庆也算举目有亲,总算还有个家在等我们。妈妈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战时生产局当收发。人都快要挤爆了的陪都重庆,哪里还能留下一个细小的职位空缺,是爸的朋友也是妈妈幼稚园同学的丈夫吴景超先生给活动的。战时生产局的局长是翁文灏,他正是清华的教授,认得我父亲。吴景超就在战时生产局工作,仗了这么大的面子,总算让我们在重庆生存下来。

我们到重庆,赶上寒假,各校都不招生。南开中学看到逃难又来了这么些人,与其成天接待说情人学的不如破例招考一次。我就是抓这个机会。妈妈说:“你得好好考啊!考不上你就没地方呆。”我低下头,看着脚尖,轻轻地点了点,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考英语,我还有香港的底子,考国文也不怕,就是考动植物我差得太远,对着选择题瞎蒙。有一题,蜘蛛是用气孔、肺还是腹呼吸的选择,费了不少脑子,最后还是选了个错的腹部。就是考算术得了个全面胜利,五题都对了,五娘还不相信。最终榜上有名,我进了最有名的南开中学。